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自民党体制的形成与变迁/
(日)蒲岛郁夫著;郭定平,田雪梅,赵日迪译.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2392-2

I. ①战… II. ①蒲…②郭…③田…④赵… III.
①政治—研究—日本—现代②日本自由民主党—研究
IV. ①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2338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封面设计 张志全

SENGO SEIJI NO KISEKI

by Ikuo Kabashima

© 2004 by Ikuo Kabashim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2004.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by t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

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

——自民党体制的形成与变迁

[日]蒲岛郁夫 著 郭定平 田雪梅 赵日迪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4.25 插页 2 字数 307,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392-2/D·2510

定价 58.00 元

大,并成为他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思想源泉。当时在哈佛大学执教的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前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也对蒲岛先生多有提携。另外一位对蒲岛先生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教授是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当时亨廷顿已经有很多著作出版,在学界声誉卓著,尤其是出版于1968年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在反省和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思想和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蒲岛先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选修了亨廷顿教授的政治发展研究课程。他结合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撰写的课程论文提交给亨廷顿教授之后,得到了很高评价,亨廷顿教授认为这篇文章已经是很好的学术论文,并建议投稿给学术杂志。原来蒲岛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主要就是以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为个案,针对亨廷顿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协调发展理论。该论文后来发表于世界顶级的政治学杂志 World Politics 上,成为蒲岛先生的成名作。

尽管蒲岛先生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但由于他的奇妙学历和曲折经历,当他回到日本开始就职活动时,很多日本大学与学术机构将他拒之门外。在他最终落脚筑波大学之后,基于他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功力,一颗学术明星迅速升腾。在日本政治学名家绵贯让治和三宅一郎的关心和提携下,蒲岛先生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研究项目,特别是参加日本选举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活动,不仅使蒲岛先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而且扩大了在日本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当代日本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学术杂志《利维坦》创刊后不久,蒲岛先生就得以成功加盟,成为四名编辑委员之一。该杂志是由日本著名政治学家东京大学教授猪口孝、东北大学教授大岳秀夫(后调入京都大学)、京都大学教授村松岐夫三人合作,于1987年创刊,以英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学名著的书名命名,旨在对当代日本政治进行实证的科学研究。在蒲岛先生加盟《利维坦》之后,四位学界同仁同心同德,共同努力,迅速把

实证分析与研究,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第三,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注重运用英语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对推动日本的政治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蒲岛先生的很多学术成果都有英文版和其他外文版,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他本人曾经担任国际政治学会副会长,在推动和加强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的同时,于2006年在日本福岡成功组织召开了国际政治学大会,扩大了日本政治学的国际影响,提升了日本政治学的国际地位。第四,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学人才,他们熟练掌握计量政治学分析技巧,保证了日本计量政治学的发展后继有人。

《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是蒲岛先生计量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作,其中既有大量的宝贵数据资料,也有许多原创的概念和理论。该书的中文版面世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可以为我们研究日本政治提供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独特的分析视角。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步较晚,时至今日在很多领域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开拓和创新,尤其是中国的计量政治学的发展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尚处于草创阶段。有鉴于此,翻译出版蒲岛先生的计量政治学研究著作,对于中国的计量政治学的发展应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蒲岛郁夫教授的《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得到了许多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蒲岛先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研究成果,而且在翻译出版过程中一直表示极大关心,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下及时立项,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本书的翻译工作由郭定平全面负责,郭定平、田雪梅、赵日迪合作翻译,王重斌和李晓茹提供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部分翻译初稿,王玮协助处理了部分图表,李书琴帮忙整理了部分译稿,最后由郭定平进行了校对和统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日本的岩波书店在版权方面进行了友好协商和良好合作,为本书在中国的顺利出版解除了后顾之忧。

断的执政能力形象开始与民主党分享。但是,由于自民党与公明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一危机也被克服了。2000年,由于森喜朗的声誉扫地而陷入危机的自民党在小泉纯一郎这一自民党内非常特殊的怪异政治家上台之后再一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笔者从1980年9月开始从事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的以来,每当举行全国性选举的时候,都尽可能地撰写发表两类不同的论文。第一类是在选举之后主要运用统计数据分析选举结果,并在综合杂志等上面发表。第二类论文旨在对政治学作出理论贡献,以前一类文章中的结论作为假说,通过自己进行的选民意识调查,或者运用其他可能获得的相关数据资料对假说进行检验,并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本书就是从这两类论文中根据主题精心选择的产物。

这些论文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是均根据相同的视角和方法进行分析,并按照时间发展顺序编排,因此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战后日本政治演变的轨迹。但是,仅仅根据选民的政治意识和投票行为来分析和说明自民党体制的形成与变迁还是不够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第一章收入了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的《自民党体制的形成》。原有的博士论文将以《发展、平等与民主——经济成长时期的政治参与与收入分配》为题另行出版。另外,本书的核心概念“牵制性投票者”一章是新写的。作为日本政治的重要因素的媒体和政治家分别在独立的章节进行了分析。如果说选举分析是纵向研究的话,这些部分就像织布的梭线一样具有横向解剖的作用。

第一部“自民党体制的形成”由第一章“自民党体制的形成——战后日本的民主化与‘支持性参与’模式”组成。这一章是全书的出发点,那些概念在其后各章不断重复使用,因此按照排球的术语来说,这一章就发挥着二传手(setter)的作用。在此预先介绍一下,所谓“自民党体制”,就是一边推进经济发展,一边把发展的成果向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农民

外,从这一立场出发,它就向政治体制“注入”了一种新的多元主义。这种模式的特征是,很多集团通过大众媒体向政治体制施加他们的影响力。大众媒体不仅在决策过程中,而且在选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在后面将具体阐明。

第三部是“自民党政治的‘动摇’”。在第七章“1989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惨败与社会党大胜的格局”中,对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结果进行了分析,对自民党而言,这样的结果有如噩梦一般。但在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看来,这一结果可谓“地动山摇”。因为自1955年以来一直维持的自民党一党优位体制开始崩溃,与此同时,选举中的焦点问题开始超越选民的政治信念和组织约束,极大地影响选举结果。从这种意义上看,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是日本政治史中划时代的大事件。本章的目的就是利用舆论调查和选举结果统计资料,力图阐明日本政治是如何“地动山摇”的,造成“地动山摇”的原因是什么。

第八章是“自民党元气恢复的格局——1990年大选”。虽然在1989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中选民使得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势力发生了逆转,但在1990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如果算上选举后追认的议席,选民赋予了自民党286个稳定多数的议席。在本章中将运用实地调查的结果,从选举中争论焦点的影响的变化、对自民党的支持的恢复机制两个侧面对参议院选举结束后不到7个月的短期内发生的从自民党大败到大胜的巨变进行分析。

第九章是“新党登场与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崩溃”。在本章中,笔者运用了作者本人担任研究代表的第二次投票行为研究会收集的大量数据资料。从自民党1955年执政以来,像1993年的大选那样认真考量是继续维持自民党政权还是实现政权交替的选举从未有过。选举结果,自民党只获得223个议席,没有过半数。在选举争议事项从政治改革到政界重组再到体制选择的变化中,选民选择的是取代自民党的新政治势力

时期”。第十二章“联合执政时期的议员与政党”的目的在于,对联合执政时期的政党从其基本构成要素的每个国会议员的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入手进行考察和分析。政党体制的最小单位就是议员,他们结合起来组成政党,制定政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分化组合。如果说议员的行为是由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指导和规定的话,那么,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各自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成为理解联合执政时期的日本政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课题。

第十三章“地方‘王国’与城市反叛——2000 年大选”是对 2000 年大选的分析。从本章中得到证明的问题包括:(1)自民党在地方的压倒性优势;(2)公明党的巨大影响力;(3)民主党成为替代政党的可能性。自民党在地方的压倒性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民党的一大困境。以前,自民党作为一个包容性政党,获得了包括城市市民在内的广泛支持。正如第二章分析的那样,投票率越高对自民党越有利的时代也有过。但是,越是过于依赖地方的强大支持,并向那里分配利益,在全体选民中已经占有多数的城市的支持者就越来越少,在此自民党遭到排斥,民主党的票田不断扩大。城市中自民党的支持基础的缩小已经成为自民党的结构上的弱点。随着自民党与民主党的力量的差距的缩小,公明党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公明党究竟是选自民党还是选民主党作为选举的合作伙伴,其选举结果大相径庭。换言之,在选举过程中和组阁过程中,公明党掌握了巨大的影响力。

第十四章“党首评价与投票行为——2000 年选举”(与今井亮佑合著)运用 1993 年以来我们收集的第二次投票行为调查数据(总共八次)对党首评价和投票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日本的投票行为研究中,以前对党首评价与投票行为的关系并不重视。但是,在 2000 年大选中,党首形象引起广泛关注。那倒不是因为出现了具有强大领导能力的党首,而是因为森喜朗首相关于“神国”、“国体”的一连串发言,以及选举前夕关于

的目标之间就会发生冲突,使得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

二、从共存理论(自由主义模式)到冲突理论

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美国政治学研究中,认为这样一些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想法占据支配地位。人们将此称为自由主义模式。例如,卡尔·多伊奇、丹尼尔·莱纳等政治学家提出了自由主义模式或者现代化理论,就认为,上述五大目标均朝着同一方向发展。^①在此,关键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如图 1-2 所示,根据自由主义模式,社会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经济平等和政治稳定,进而促进民主的政治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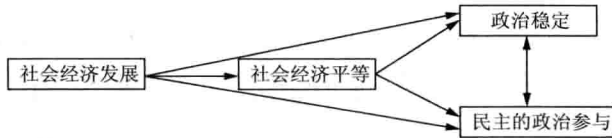


图 1-2 共存理论(自由主义模式)

然而,自由主义模式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和 70 年代则遭到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在主张冲突理论的学者看来,民主化的各项目标不能同时实现,它们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之中。例如,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就难以并行不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就曾经提出了著名的 U 型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几乎所有的人都处于贫困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很高的平等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提高,不平等会随之扩大。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社会政策的调整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社会平等逐步增加。就是说,经济发展和

^① Karl W.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1, Vol.55, No.3, pp.493—514.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Free Press, 1958.

第二章

田中派大胜、自民党大败的格局*

——1983年众议院选举

1983年众议院选举不愧被称作“田中判决选举”，选举战之中出现的政治伦理因素备受关注。又因为1976年众议院选举是“洛克希德选举”，这七年间田中可谓是一直处于风口浪尖。此次选举意味深长，它包含了现代日本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政治伦理与自己选区利益的取舍、流动票的力量、在野党之间的合作等。大多数研究者将自民党大败的原因归结为田中判决风波的负面影响、流动票脱离自民党、在野党之间的合作等。本章将对这些论点进行梳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对选举结果进行总结。

选举是民主政治中普通选民表达自己政治选择偏好的唯一一次机会。实证分析研究者的任务在于准确地整理分析选举结果，告知决策者其含意，同时反馈给选民，向他们提供可以进行一些理论讨论的事实。

我们的问题意识有以下几点：（1）果真是流动票导致了自民党的败北吗？假设真的如此，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奏效的呢？（2）田中判决风波对田中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3）在野党之间的合作确实有效吗？如果真的有效，那程度又是如何呢？接下来将对以上疑问逐一进行客观分析，并借此来鸟瞰日本政治。

* 本章内容来自以下论文，[日]松原望、蒲岛郁夫：「田中派圧勝自民党大敗の構図」、『中央公論』1984年3月号。本章使用的MK指数为作者原创，MK取自松原(Matsubara)、蒲岛(Kabashima)两人英文名字的首字母。

大到能够动摇靠地区利益诱导政治巩固起来的选区地盘的程度。

第四节 在野党之间的选举合作

在野党之间的合作是在全国 58 个选举区、59 名候选人之间进行的。他们采取的战术是将那些因没有可支持的政党候选人而没有去处的选票横跨选区进行交换,并积极加以利用,这对自民党候选人特别是排名靠后的候选人而言,就成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这次在野党之间达成的合作有 87 件。自民党最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因流动票脱离而疲于应对,排名靠后的候选人则因在野党之间的合作而苦不堪言,正可谓被上下夹击。由于在野党之间的充分合作,众所周知,在野党大获成功,形成与执政党势均力敌的局面。

公明党在 20 个选区以 19 胜 1 败的成绩大获全胜,其原因在于积极利用了上次选举中票数仅次于当选者的候选人的有利条件。从数量上来看,接受合作的公明党候选人的 MK 指数平均增长了 0.48。通常情况下,如果调查包含当选者以及落选者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 MK 指数分布,便能发现最后一名当选者与差点就当选的落选者的 MK 差值,即所谓的“当选门槛”仅为 0.4。公明党候选人因为在野党之间的合作而迈过了这个当选门槛。

民社党在 24 个选举区取得了 19 胜 5 败的成绩。接受合作的民社党候选人的 MK 指数平均增加了 0.32,差一步就迈过了当选门槛。选举合作中存在一些现职(大多是经不起选举的)防卫,民社党多此情形。

社会党在 7 个选举区 5 胜 2 败, MK 指数平均增长了 0.52。新自由俱乐部在 5 个选举区 1 胜 4 败, MK 指数平均仅仅增长了 0.12。从这里便可看出政党势力的衰退。

至此,我们仅简单地通过接受合作的候选人的 MK 指数的增长,观测了在野党之间的合作效果。的确,在野党之间的选举合作增强了接受合作的候

一选区会推选多个候选人,不仅是政党之间,就是同一政党内部的候选人也要进行竞争。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竞争时,就很难以政党的政策为基础开展选举战了。这些候选人,往往会在党组织之外独立建立自己的后援会等支持组织。其结果就是,与政党之间的争论议题的差异相比,候选人的个人宣传、支持组织的强弱及其影响力的大小更会左右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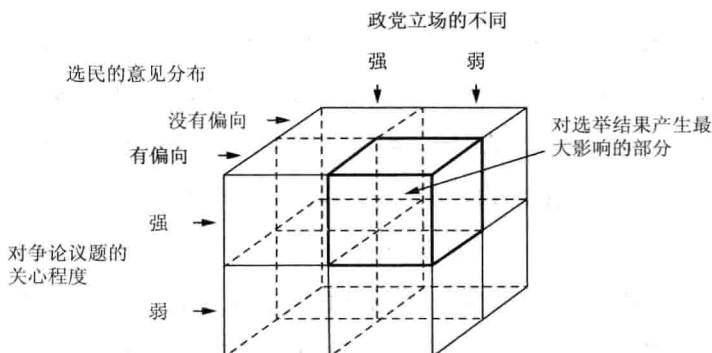


图 3-1 对选举结果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争论议题的特质
(引自 Butler and Stokes(1974. p.294))

高昌通敏将日本的政治体制定义为管理民主主义,并认为在这种体制中以争论议题为基础的选举很难实行。他说:“众所周知,在日本社会,选举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整个管理组织体系通过各种各样体系化的管理组织夸耀自己社会势力之强大的活动。‘搞定选票’行为是通过社会组织体系来进行的,投票是一种证明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度的行为。”^①

高昌的理论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两个方面:(1)选民的组织化程度;(2)选民的认识中争论议题的重要性与对组织的忠诚度的重合性。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成长,没有加入任何组织的选民增加

^① [日]高昌通敏:《现代日本的政党与选举》(日文版),三一书房,1980年,第288—289页。

了,而且随着教育水准的提高,可以说组织的约束力也降低了。没有被组织化的选民、对组织的忠诚度较弱的人,受“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影响进行投票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即使选民对组织有很高的忠诚度,重要的争论议题出现的时候,选民会平衡争论议题的重要性和对组织的忠诚度二者的关系,进行比较与讨论。

三宅一郎认为,以政策议题为基础的选举和高阜所说的以组织动员为基础的选举有并存的可能性。他说,“现代的选举确实如高阜所说是组织与组织的较量,但是,没有真正进入组织网络的人相当多,组织的约束力近年也大幅下降。而且,选民中政治知识的积累不断增加,能够认识争论议题并以其为基础作出判断的拥有政治技能的人不断增加。石川真澄指出,‘仅仅不到百分之一的选民的变化就有可能引起政坛地震’。具有政策取向的选民即使是少数,一旦发生这种少数选民的态度变化而引发的重大变动,难道这不可以称为‘以政策为基础的选举’吗?”^①

在日本的选举中,按照争论议题投票引发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这一情况需要进一步地深入思考。日本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五五年体制”成立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选民基本上倾向于自民党体制。我们就哪个政党的候选人和领导人的资质最好,或者在实行不同政策的情况下哪个政党是最适合的政党,进而将这些综合起来看哪个政党作为执政党最为适合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 3-1 所示。支持自民党的人占 47%,支持在野党占 29%,没有支持的政党占 24%。

从表 3-1 来看,与政党支持水平相比,对自民党的评价大大下降的是,在处理政治腐败问题上的评价,与政党支持基本持平的是在候选人的

^① [日]三宅一郎:《政党支持分析》(日文版),创文社,1985 年,第 251 页;石川真澄:《战后政治构造史》(日文版),日本评论社,1978 年,第 91—92 页。

资质、职业利益代表、物价经济政策主张等方面的评价。在基本政策和地域利益代表方面对自民党的评价比对自民党的支持水平略高。认为自民党在外交政策主张方面合适的选民有 76%，大大超过了对自民党的支持水平。

表 3-1 选民认为政策主张最合适的政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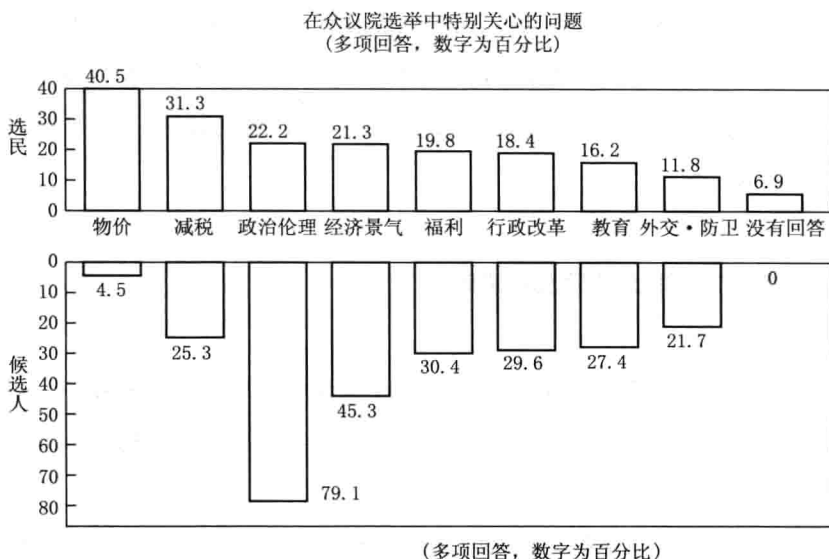
	自民	社会	公明	民社	共产	新自	其他	没有
候选人的资质	49	13	7	7	6	3	1	12
最好的党首	53	12	6	8	4	2	1	14
基本政策	53	13	6	8	6	2	1	12
职业利益代表	46	21	4	8	7	1	0	13
地区利益代表	57	9	9	3	7	1	0	14
消除政治腐败	23	16	9	8	15	2	1	25
物价与经济政策	44	16	7	6	7	1	0	19
外交政策	76	4	4	2	3	0	0	11
执政党	74	8	4	2	3	0	0	9
支持的政党	47	15	4	5	4	1	1	23*

注：表中数字是除去 DK(不知道)、NA(没回答)后占有效回答数的百分比。

* 没有支持的政党。

对自民党在这些政策主张方面的评价更重要的是，高达 74% 的选民认为自民党是最适合的执政党。认为在野党是最适合的执政党的选民总共不超过 20%。也就是说，日本的选民的大多数基本上希望自民党政权能够持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大多数选民对自民党表示积极支持，不如说是在 1955 年以后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中，人们对在野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大家认为与其要承担让在野党执政的风险，还不如让自民党体制持续更好。

选民的大多数尽管希望自民党体制持续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自民党积极地给予支持。根据 1983 年 12 月的 NHK 调查，希望自



在众议院选举中列为重点的问题

转引自读卖新闻社编《83年三大选举分析》(1984, p.193)。

注:“选民”部分是对9万3千人的舆论调查,“候选人”部分是对所有候选人做的问卷调查,两者均为读卖新闻社在选举日期公布后所进行的调查。

图 3-2 选民和候选人对第 37 届众议院选举的重要争论议题的认识

本相同的倾向^①。

这些数据表示的是从已经准备好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中选择出来的选民关心的争论议题的重要程度。这种调查方法的优点是,研究者不必自己确定政策争论议题,也不必将自由回答的答案进行编码,可以减去很多繁琐。但是,研究者认为重要的争论议题与选民关于争论议题的认识有可能是不一致的。而且,让回答者看着争论议题的一览表并从中选择答案,即使是对争论议题还没有形成自己意见的人也可能会回答。为

^① 根据参议院选举后的调查结果,各个政策课题的重要性排名如下:(1)经济恢复,64.6%;(2)修改不公平税制,57.5%;(3)解决教育与差生问题,49.7%;(4)充实福利措施,49.6%;(5)缩小财政赤字,33.5%;(6)推进行政改革,30.7%;(7)改善居住环境,27.4%;(8)加强政治伦理,25.7%;(9)处理贸易摩擦,21.5%;(10)扩大市民参与,14.8%;(11)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13.1%;(12)增强防卫力量,9.8%;(13)推进地方分权,9.4%;(14)扩大对外援助,9.3%。

别是,当选民明确地认为在野党是减税推进政党的时候,减税问题会对自民党产生威胁。与此相反,日美安保争论议题是对自民党起正面作用的。防卫争论议题与行政改革争论议题对选举结果产生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最后,阐述一下本章分析的局限性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本章的计量模型分析,由于数据的限制,不得不将执政党的缓冲规模作为一个固定值来处理。但是,正如本章数据显示的那样,选民的大多数(74%)认为自民党作为执政党是最合适的,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还期望将自民党政权置于执政党与在野党不分伯仲的不稳定状况中。由此可见,执政党的缓冲规模极其小,当自民党的政策实施变得困难的时候,可以推测,希望自民党政权持续的选民不论争论议题评价如何都会给自民党投票。与此相反,像本次众议院选举一样,自民党的议席和在野党的议席之差非常大,媒体也预测自民党会大胜的状态下,选民的认识中执政党的缓冲规模足够大,多数选民就放心地根据争论议题评价(特别是有关政治伦理问题)进行投票,给予自民党一定的惩罚。实际上,这种缓冲规模、政党支持和争论议题评价对投票行为的相互影响可以从表 3-5 和图 3-4 中看到。执政党的缓冲规模极其小,自民党的执政能力出现危险信号之后的 1980 年众议院选举中给自民党投票的选民中,在最重要争论议题方面认为在野党与自己的偏好最接近的人中,在这次的众议院选举中再次给自民党投票的有 6 成,2 成流向了其他政党,2 成弃权了。也就是说,根据争论议题评价进行投票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执政党缓冲规模的函数。执政党的缓冲规模的效果分析是今后的课题。

第四章

牵制性投票者的登场

第一节 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与牵制性投票者

日本自民党从 1955 年成立以来,到 1993 年 7 月大选后暂时失去政权为止,执政长达 38 年,即所谓五五年体制。在没有政权更替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很好地吸取了民意,对国民的问题做出了应有的回应呢?

民主主义的原则是,选民通过选举有效地使政治家及执政党更替,以确保政府对国民的回应性,同时也防止权力的腐败。通常认为在同一政党长期执掌政权的一党独大体制下,政府对国民的反应性欠缺,而且这样的政治体制的产生被认为是由于选民的政治意识很低。

但是,日本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是否如所说的那样坚不可摧?日本选民是否容许了磐石一样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没有对自民党政权的回应性提出要求呢?

即使是一党独大,在国会所占议席数还是有所增减的。在此考察一下其议席数增减的关键因素。图 4-1 表示的是在众议院自民党议席数超过半数以上的变化曲线图。从此可以看出,一直到 70 年代末为止,自民党在众议院所占议席数持续递减。但在此之后,围绕过半数的原点,出现了自民党胜负反复的现象。虽说是自民党独大体制,但自民党的议席数仍然有所增减,这一体制存在着并不强大稳定的时期。那么如何解释这种议席数变化的原因呢?

到 70 年代末为止的自民党议席数的持续减少是由于都市化造成的。农村选民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地缘—血缘—团体等保守性社会网络,随着

如果缓冲规模影响了选举中自民党支持率变动的話,那么一定存在着考虑到此因素的投票者。这样的选民正是牵制性投票者(buffer player)。

牵制性投票者可以定义为“基本上期望自民党掌权,考虑到政局应保持执政党与在野党势均力敌态势而进行投票的选民”。牵制性投票者是自民党执政长期化,在野党执掌政权能力不足情况下产生的日本独特投票行为的选民。他们期待自民党政权持续以达到政治的安定性,置自民党于朝野势均力敌之不安定状态,以达到其对国民的回应性。这样以来就给予了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一种持续性和不安定性。当牵制性投票者感觉到自民党的权力过度膨胀几乎背离了国民时,他们就会离开自民党。但他们并不希望政治混乱威胁到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于是当自民党政权陷入执政危机,在野党即将夺取政权时,他们又回归自民党。对在野党的执政能力缺乏信心的状况下,通过采取手段持续支持自民党政权的同时,为避免自民党过于强大而采取牵制措施的选民的存在,是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人投票行为的特征。

以下通过实际的舆论调查数据来阐明牵制性投票者的存在,并揭示其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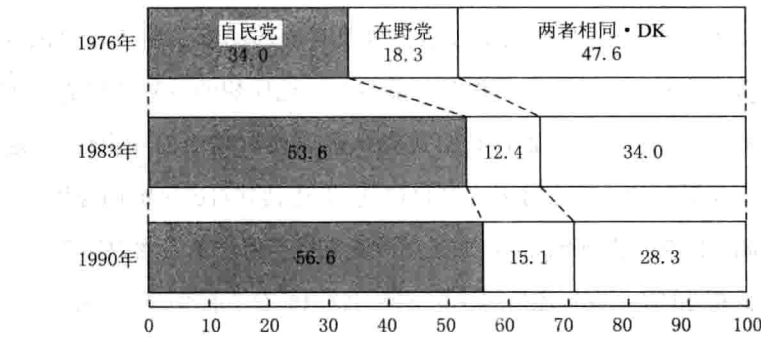
第二节 牵制性投票者的存在及其行动

牵制性投票者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呢?其存在是否解释了上述所说的自民党议席数的增减呢?

一、牵制性投票者的存在

在确认牵制性投票者存在之前,对牵制性投票者的定义作以下说明:认为自民党具备执政能力的同时并不期待自民党在国会中独占稳定优势、最好是朝野保持势均力敌的不安定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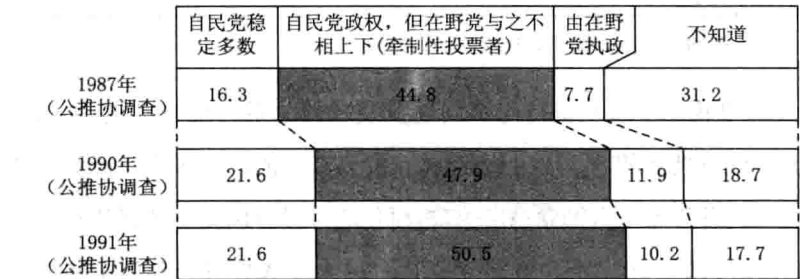
领域相比上升幅度特别大。此倾向从图 4-2 也可以看出。1983 年以后，认为自民党为最适合执政政党之比率逐次递增，1990 年上升至 57%。此结果说明在 80 年代初叶认为自民党是唯一最适合执政政党的选民激增。



注：1976 年、1983 年和 1990 年的数据是分别通过委托 JABISS、JES 和中央调查社进行综合调查所得出的结果。

图 4-2 认为自民党能够胜任执政党角色的选民的比例变化(%)

其次，把牵制性投票者的存在从“并不期待自民党在国会中占有稳定优势，期待置之于朝野势均力敌之不安定态势”这一方面来考察。图 4-3 表示的是 1987 年以后，对选民所期待的国会中朝野势力之比的调查结果。如果从牵制性投票者的“登场”这一观点来看，必须有 70 年代的数据



注：公推协是指公正选举推进协会。

图 4-3 选民中“牵制性投票者”所占比例(%)